

探究图书馆学家戴志骞转行与归宿之谜

——戴志骞生平再考

□ 顾焯青 郑锦怀 曹海霞

摘要 从戴志骞寄给美国校友的两封信件、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的学生登记簿以及戴志骞博士论文的导言等一手英文史料中,发现戴志骞早年学习勤奋、成绩优异,但身体状况不佳,几度影响到学业和事业。1930年,他因病辞去中央大学副校长之职,赴东北疗养。其间,他考察了满洲地区的资源和经济发展情况。为阻止日俄势力侵入,开发东北边疆,实现国家和平,戴志骞决心在满洲充当一名金融与投资领域的拓荒者。为此,他放弃了原本的专业,并有意将自己在图书馆界和大学管理界取得的地位让给训练有素的年轻一代。1931年以后,戴志骞长期就职于中国银行。1951年,他和夫人移居阿根廷,直至1963年逝世。

关键词 戴志骞 生平 图书馆学家 图书馆学史

在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史上,不乏专家级的“失踪者”,我们不知其完整生平,王余光教授就曾列举过一些生平不详,有待查考的图书馆学人^[1],戴志骞便是其中之一。无论是韦庆媛^[2]、郑锦怀^[3]还是平保兴^[4]所述,都未提及戴志骞解放后的行踪。对他离开图书馆界的原因,郑锦怀没有论及,韦庆媛所披露的史料也只能说明他被迫离开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的原因。对于戴志骞步入银行界的缘由,韦庆媛提出了一些个人的揣测:“不知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但象牙塔的动荡,学潮频仍,足以使戴志骞决定放弃他所钟爱的事业”,“不知是否真如蒋梦麟先生所说,戴志骞因银行待遇太好,而永远放弃了图书馆事业”。我们未见有可信史料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1 迟到的发现:涂光霁博士首度揭开戴志骞生平迷雾

我们迟到地发现,早有旅美台湾地区学者涂光霁(Kuang-Pei Tu)利用美国一手材料述及戴志骞的离职原因及归宿。涂光霁在其博士论文《西方知识和价值的转换与传播:20世纪早期中国图书馆服务的形成》(*Transform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Knowledge and Values: the Shaping of Library Service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

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6)中专门列出了一个附录“中国早期图书馆员的生平简介”(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Early Chinese Librarians),其中就包括对戴志骞的介绍^[5](该附录中的戴志骞部分,以下简称涂文)。涂文引用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找到的一些一手材料后指出:戴志骞是因为健康原因而被迫辞去中央大学副校长职位。1951年,戴志骞夫妇从中国移居阿根廷。在那里,戴志骞静养身体,而戴志骞夫人则又在美洲社区学校图书馆工作了7年之久,直到1958年退休为止。涂文还给出了戴志骞的卒年:1963年。涂光霁博士的研究成果并未得到很好的传播,论文发表后很长时间内未被大陆图书馆(学)史研究界所关注。北京大学范凡在其博士论文(已公开出版)^[6]和相关论文^[7]中均介绍了该文的附录,我们也正是通过范凡博士论文提供的线索,进一步查阅到涂文原文。

2 两封书信解谜转行

可惜涂文没有全文引用那些原始材料,我们所知还十分有限。在涂光霁博士给我们的热情回信中,她坦言当时很幸运地查阅到留存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的所需档案,因为当时该学院已濒临关闭。哥伦比亚大学关闭图书馆学院以后,这些档

案材料都被移交给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图书馆学院。很遗憾,她未能帮我们找到当年撰写博士论文时留存的原始档案复制件。几经周折,我们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图书馆中找到了涉及戴志骞转行原因的两个原始文档,即《图书馆界消息》上摘登的戴志骞寄给两位美国校友的私人信件。

《图书馆界消息》(*Library Service News*)受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赞助与支持,面向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与纽约公共图书馆图书馆学校的校友发行,几乎每期都刊登有校友动态(*Among the Alumni*)。1931年的一份校友动态上刊登了一则关于戴志骞的信息^[8],翻译如下:

戴志骞博士(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1918)一直都跟(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免费(公共)图书馆馆长约翰·B·凯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1910)保持通信联系。经凯泽先生首肯,我们对其中一封信件摘录如下。戴博士于1925年从爱荷华州立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戴夫人名叫茉莉·鲁梅尔霍夫(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1919)。

“1928年,我被选为北平扶轮社社员,但去年夏天离开北平前往哈尔滨时,我辞去了这个职务。我不记得是否写信告诉过你我已改行。7月,我辞去国立中央大学副校长一职。中央政府不想接受我的辞职,但我再三递交辞呈,到了第四次,他们终于让我辞职了。从5月到7月,我在南京病得十分严重。6月8日,我以为,我的医生们也认为,我无法度过这次危机,但我终究还是努力度过了这个难关,逐渐恢复健康。当时我患上了白喉以及某种猩红热,后来又患上了风湿热。南京的气候与生活环境不适合我。7月,我设法去了北平,身体复原了。9月,我前往中国与西伯利亚之间的边境城市哈尔滨,成为一家金融商行的经理。10月底,我被派往上海和南京跟政府交涉借贷事宜。

“我已经在图书馆管理界和大学管理界工作了19年。我觉得我应当让位给受过专业训练的年轻人了。与此同时,我深信,除非其自然资源开发科学、交通设施建设完善,否则中国无法变得和平。满洲和蒙古合起来比中国本土还要更大,而如果中国忽略这些边远地区的发展,30或40年后,它们将不属于中国了。满洲(东北)四省蕴藏有特别丰富的各类矿产,而且它们那些未经垦殖的土地很适合种植谷物与豆类。将山东与河北两省的壮年汉人迁往

满洲,并引进国际资本(日本与俄国资本除外),是阻止日本与俄国影响力渗透的根本性政策。出于这种信念与梦想,我决心放弃我的专业,努力在荒凉的满洲(东北)边疆四省充当一名金融与投资领域的拓荒者。我受邀担任(哈尔滨)中国殖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经理。9月开始任职以来,我一直在哈尔滨、奉天(沈阳)、上海、南京与北京之间来回奔波。一旦得空,我就发奋研读公司财政、商业及其相关领域的书籍。我喜欢我的新工作。我觉得它魅力十足。”

1932年又有一则信息^[9],翻译如下:

戴志骞博士(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1918)很可能是惟一一位成为银行家的校友。1931年8月,《图书馆界消息》上摘登了他的一封信件,其中提及他在中国图书馆界服务19年之后的某些活动。以下片断则选自他写给《十进图书分类法》编辑多克斯·菲娄兹(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1899)的一封信,为我们补充了其颇为有趣的职业生涯的另一篇章。

“自从日本于1931年9月18日入侵满洲(九一八事变),又于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不宣而战以来(一二八事变,或称上海事变),我们无疑经历了一个十分可怕的时期。1月15日,我从北平返回上海。两周之后,上海事变爆发。战斗区域离(中国)银行不是很远,离我的住处甚至还要近上许多。那无疑是一段饱受煎熬的时期。我能听见日军大型舰炮发出阵阵咆哮声,震得窗户与屋顶颤动不已,也能听见日军飞机投下大量炸弹,传来阵阵爆炸声。从我们银行大楼楼顶望去,可以清楚地看见闸北地区房屋着火时的冲天烈焰。除了面对战争的恐怖,我们还要冒着巨大压力进行工作,以避免在那个危急时期发生金融崩溃。3月,上海事变仍在进行之中。我被(中国)银行派往满洲,跟把持着新满洲国的日本当局交涉关税与盐税的征收以及银行事务。我跟同事一起去了包括新京长春在内的许多城市,最远的是哈尔滨。

“可能我有必要用几句话叙述一下南京中央政府成立以来我的个人事务,以便将我的当前状况解释清楚。1928年10月,我被任命为江苏大学区高等教育处处长,后来又被中央政府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副校长。部分是因为管理一所大学及其下属大学区的工作压力十分繁重,部分是因为自身健康状况不佳,我的医生建议我前往气候干燥的北方地区,以便恢复身体健康。于是,我辞职前往满洲,考察那

里的工业发展可行性与经济状况。有赖于北满的给力气候,我的身体与工作热情完全恢复了。去年7月,我受邀加入中国银行。现在,我是该行人事课课长,同时代理总秘书一职。该行在中国与满洲各地都开有分行,在日本大阪和英国伦敦也各开了一家分行。

“1928年秋天以来,我跟图书馆管理界和教育管理界断绝了联系。现在,我在银行界工作。从图书馆到大学,从大学到银行,这些行业差别很大,但我一直都是在管理工作当中跟人打交道。

“我们全家都希望继续在图书馆界工作。我夫人现在是北平协和医学院图书馆馆员,而我女儿将去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就读。”戴夫人名叫茱莉·鲁梅尔霍夫(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1919)。”

至此,戴志骞在中央大学离职和最终转行到银行金融界的原因终于大白。我们曾阐述过书信在图书馆学人研究中的价值和作用^[10],戴志骞写信时也不大可能想到信件日后会被公开并受到关注。因而,他在信中流露出来的想法应当是真实的,其可信度较高。涂文简单地认为:“戴志骞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加上教育管理专业的博士背景,两相结合,使得他最终离开了他的图书馆事业”,这一说法并不确切。健康状况不佳是促使戴志骞奔赴东北休养与考察的诱因。但是,在东北康复之后,他完全可以再回到图书馆界中来,而他并未如此。东北的发展潜力与严峻形势所触动的藏于其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以及他那颗关爱并且乐于提携后辈的宽仁之心,才是导致戴志骞最终放弃原有专业,一心转行至金融银行界的根本原因。

虽然戴志骞离开了他心爱的图书馆职业,但他的挪威籍夫人茱莉·鲁梅尔霍夫(中文名为“戴罗瑜丽”)却将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中国图书馆事业。1922年9月至1928年8月,她在清华学校图书馆西文编目部工作。1928年9月—1936年8月,她担任北平协和医学院图书馆主任,成绩斐然,为民国时期医学图书馆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戴志骞在信中还提及他们的女儿准备去文华图专就读。不过我们查阅文华图专历届毕业生名单^[11]发现,在1930年前后并没有戴姓女性学员。文华图专本科第十六届(1940.9—1942.6)有一位女生名叫“戴湘波”,但她就学时间与戴氏信中(1932年)所言“将去就读”相差甚远,且该生的籍贯为“湖

北江陵”,与戴志骞的籍贯江苏青浦不符。此外,文华本科第十六届(1938.9—1940.6)有一位女生的籍贯为江苏青浦,但她名叫孙雁征,并不姓戴。因此,戴志骞的女儿后来是否真的进入文华图专就读,存疑待考。

诚如韦庆媛所言,“即使在离开图书馆多年后,他(戴志骞)仍然关心图书馆的发展,对他曾倾注极大热情、付出艰苦努力的图书馆事业留有限眷恋”^[12]。除了韦庆媛提及的一些情况外,我们至少还能找到如下记载,以如实反映戴志骞转行后与图书馆界未曾隔绝的关系:1932年7月,上海创制中学添设女子部图书馆科,招收初中一年级的新生或二年级的插班生,培养中小学及公共图书馆的实用人材。戴志骞(戴超)夫妇与杜定友、洪有丰、李小缘、沈祖荣、刘国钧等七人受聘担任指导委员^[13]。1935年4月1日,戴志骞当选上海市图书馆临时董事会董事(郑锦怀亦提及);在4月16日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决议戴志骞同王云五、杜定友、洪述等董事草拟上海市图书馆第一年预算^[14]。1936年,作为文华图专的校董,戴志骞还因当年学生人数较多,特捐赠特等新式打字机一架,以供实习之用^[15]。1954年11月12日,台湾地区“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二届年会在台北召开,戴志骞被增聘为名誉理事^[16]。

3 终老异国他乡:未尽的归宿之谜

涂文中有关戴志骞归宿的信息来源有二。其一是戴志骞夫人于1963年4月23日写给凯泽(Dean Kaiser)的信。此信收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研究生院的毕业生档案(Alumni Files of Graduate School of Library Service, Columbia University at Columbia University)。依照涂博士给笔者的回信,这些档案现在都转移到了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几经努力,我们仍未能从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档案馆中找到这封信。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对确切的卷宗目录号,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私人信件档案需要有关领导同意后才可查阅,而我们尚未获得许可。

其二则是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的学生登记簿(New York State Library School Register, 1887—1926)。这本册子记录了该校历届毕业生的就读时间、获取学位信息,就读前和毕业后的工作经历。其中所录学生毕业后的相关信息多是学生自己提供

给母校的,比较可靠,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一手史料。该登记簿有多个版本,我们查到的1928和1959年两个版本上均载有戴志骞夫妇两人的信息。1959年版中记录的戴志骞自1931年进入中国银行后的履历为:1931年8月—1933年,在上海担任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人事课课长,1933—1950年间,辗转上海、汉口、重庆担任中国银行总秘书。当前通讯地址:R. S. Pena 851 Fondo, Olivos FCNGBM, Buenos Aires, Argentina^[17]。戴志骞夫人的履历为:1928年9月—1936年9月,担任北平协和医学院图书馆主任(洛克菲勒医学院,北京,中国);1951年4—7月,在香港担任香港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1952年4月至今,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美洲社区学校担任图书馆馆员;1933年,出访美国多家医学图书馆。当前通讯地址:R. S. Pena 851 Fondo, Olivos FCNGBM, Buenos Aires, Argentina^[18]。我们推断,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之际,戴志骞仍旧就职于中国银行,可能留在尚未解放的重庆;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以后,他可能跟妻子一起前往香港,但未进入有关单位任职(一方面他已经年过六旬,另一方面他的身体状况可能也不好);1951年8月,他与妻子一同远赴南美阿根廷,终老于彼。

由于1959版的学生登记簿没有戴志骞的逝世时间,也没有他在阿根廷疗养而其夫人工作到1958年退休的记述,所以涂文的依据来自戴志骞夫人于1963年4月23日写给凯泽(Dean Kaiser)的那封信件。我们可以推断戴志骞的逝世时间应当是在1963年1月1日至4月23日之间。不过,他的具体逝世日期,以及在阿根廷的晚年生活具体如何,尚不得而知,只能留待日后找到戴志骞夫人写给凯泽的那封信件,并依循他们的“当前通讯地址”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寻找相关地方性史料了。

4 早年生涯等生平信息续补

通常,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和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未来一生的发展。戴志骞的早年生涯亦是其生平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部分。郑锦怀曾在韦庆媛的基础上对戴志骞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期间的情况有过专门的考证,但所获的信息还是很有限,没有进一步阐述戴志骞早年的学习状况、个性特点等。戴志骞博士论文正式出版之时,收录了他的学长、好友兼其攻读博士学位所在学校——美国爱荷华大学

的图书馆馆长约翰·博因顿·凯泽(John Boynton Kaiser)专门撰写的“导言”^[19]。凯泽在导言中生动而详细地向读者介绍了戴志骞刻苦学习、成绩优异的早年读书生涯以及两次赴美前后的一些尚不为我们所知的情况。综合凯泽的“导言”及其他史料,我们将戴志骞的早年生涯介绍如下:

1888年2月27日^①,戴志骞出生在江苏省青浦县(现为上海市青浦区)的朱家角。1894—1903年,上私塾。1904—1907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预科^②。毕业时因成绩优异而获得溥伦贝子奖牌(Prince Pu Medal^③),同时因演说最为出色而获得圣约翰校友奖牌(St. John's Alumni Medal)。他早年所受教育包括对中国典籍与史册的研习。1907—1909年,戴志骞在温州瑞安公立中学堂(Jui-An High School, Wenchow)教授历史和文法(grammar)。1909年,他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并成为该校图书馆(室)助理。1912年,他从圣约翰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并再次因为演说出色而获得奖牌。郑锦怀原先根据戴志骞获得学士学位的时间,逆推他应当是在1908年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这一论点跟实际情况不符。一方面,戴志骞之前已经读过圣约翰大学预科,未必需要再读四年本科;另一方面,1912年只是他获得学士学位的时间,不一定等同于正常的大学毕业时间,因为学生只需达到一定条件就可获得学位。查考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史,为帮助学生获得学位,该校于1906年初制定公布了学生获得学位的办法,1906年以前毕业的文理科毕业生,可通过两种方法获得学位:其一,返校重修规定的四年级课程,并且考试成绩达70分;其二,提交一份经教员同意的一周在校学习20小时的学习计划,学完相关课程之后,经教员核准,参加考试,如成绩达到70分,就可在下届毕业典礼时被授予学位^[20]。戴志骞极有可能通过第二种方式,一边在图书馆兼职,一边读书,在三年之内成绩优异,顺利地拿到了学士学位。

① 原文未说明这是传统农历还是转换后的公历。

② 原文为“as a student at St. John's Preparatory College, Shanghai, from 1904—1907”,据考察,圣约翰书院于1905年12月30日才于美国注册成功,升格并改名为“圣约翰大学”。因此1904—1905年,戴志骞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书院预科;1906—1907年,因学校升格、改名,戴志骞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预科。

③ “Prince Pu”当指“Prince Pu Lun”,晚清宗室溥伦贝子。

1912—1913年,戴志骞继续在圣约翰大学攻读研究生^①。他接受的研究生教育包括哲学、社会学与教育学领域的专门研究。1913年底,他的健康状况变得很差,以至于他不得不暂时放弃继续攻读研究生的想法。我们尚不清楚戴志骞是先天体质较差,还是因在圣约翰大学就读期间过于刻苦而影响身体。但这或许已经为日后他在中央大学工作期间的病重埋下了隐患。

1917年,戴志骞以留美学生监督处(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秘书的身份第一次赴美。同年晚些时候,他进入阿尔巴尼的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就读,并在不到12个月的时间内克服语言方面的困难,修完了原本需要两年时间的专业训练课程,获得图书馆学学士学位(BLS)(即比他的同班同学、后来的夫人早一年获得学士学位)。美国本国人罕有能做到这一点,这再次证明了戴志骞学习之勤奋。“被问及第一次来美国能否讲英语时,戴先生天真地说道(目光炯炯有神。每当东方人前来,你都能看见那种目光):‘喔,是的!但没人听得懂!’”这为我们展现了戴志骞性格率真的一面。

凯泽的同学兼朋友麻伦教授(Professor Carroll B. Malone)曾在1911年清华学堂初办之时就来到中国,担任该校最初的教职员工之一。他曾寄信回美国,要求获取一些信息与书籍,以指导新教职员工按照美国方法办好这所新办学校的图书馆。他获得了一些建议与技术性出版物,多数是来自美国图书馆界各个时期重要作者个人的慷慨捐赠。当获悉清华学校图书馆主任戴志骞现在也就读于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时,凯泽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且很快就跟他取得了联系。美国加入了“一战”以后,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图书馆战时服务得以发展起来。戴志骞也参加了战时服务,于1918年10月至1919年6月担任纽约阿普顿军营图书馆助理馆员,期间还担任《留美学生月报》(*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Current literature section 版的编辑部主任^[21]。1919年1月,当凯泽来到阿普顿军营担任军营图书馆馆员时,惊喜地在那里看到了戴志骞。他们的熟识之花很快就结成了友谊之果。事实表明,戴志骞一直以来的勤劳、才能与良好的服务精神为他赢得了军营图书馆所有同事的真诚赞誉。在许多个欢乐的午夜,他们围着篝火聊起儒家学说,汉字演化,以及其他东方主题。1919年左右,戴志骞加入美国图

书馆协会。1919年6月,戴志骞在阿斯伯里公园大会上协助美国图书馆协会展示其图书馆战时服务成果。同年秋天,戴志骞穿越太平洋,返回中国,再任清华学校图书馆主任一职。

回国后,除专职服务于清华学校图书馆外,戴志骞还广泛参与图书馆界和其他社会各界的很多活动,在很多机构或社会团体中担任职务。1920年,他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期图书馆学讲习会(the Library Science School, Summer Course, at the National Teachers' University, Peking)的负责人。次年,他参与创办了上海总商会商业图书馆(the Commercial library of the Chines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at Shanghai)^②。1919—1922年,他担任天津南开大学图书馆的顾问。1926—1928年,他担任松坡图书馆馆务委员会委员。他还是中华民国总统委任的即将在北京建立的国家图书馆的筹备委员会(the Organization Committee for a Chinese National Library)的7位委员之一,而其他委员均为中华民国的现任或前任内阁成员。不过,这可能是1925年前后戴志骞得到的非最后正式任命通知。目前查到的文献记载为:1926年3月1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决议自办“北京图书馆”,由范源濂、任鸿隽、周诒春、张伯苓、戴志骞等5人组成“北京图书馆委员会”;1927年7月,“北京图书馆委员会”改组,委员有周诒春(委员长)、任鸿隽(书记)、李四光(会计)、张伯苓、戴志骞、袁同礼;1927年9月,“北京图书馆”特设建筑委员会,聘周诒春、李四光、戴志骞、袁同礼、安那5人为委员;1928年7月,“北京图书馆委员会”改组,委员有任鸿隽(委员长)、袁同礼(书记)、胡先啸(会计)、周诒春、丁文江、陈垣、张伯苓、戴志骞、叶企孙,北京图书馆改名为北

① 1913年圣约翰大学试办大学院(即研究生院),开展研究生教育。见徐以骅.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8

② 据《上海总商会商业图书馆图书目录》,该馆的英文名称为“The Business Library of th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of Shanghai”。《上海图书馆史》(胡道静,1935)等文献认为上海总商会商业图书馆在1921年秋由上海总商会会长聂其杰、秦祖泽等人倡议建立,并未提及戴志骞。但据史料记载,聂其杰等人确实延请了时任清华学校图书馆主任的戴志骞来会筹办,而他在参与筹办过程中对拟应配备的图书种类和图书馆地点等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参见: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761

平图书馆,10月后又改名北平北海图书馆;1929年2月北平北海图书馆成立购书委员会,委员有任鸿隽(委员长)、胡先啸(会计)、袁同礼(书记)、周诒春、张伯苓、戴志骞、陈垣、丁文江、叶企孙^[22]。戴志骞和名气更大的社会名流一同当选今天国家图书馆前身机构的委员,足见他在文化界的影响之大。他加入的社会团体还有中国科学社、the College Men's Club of Peking、the Advisory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League of China、the Peking Literary Club、the American College Club in Peking等。他还是美国长老会中国差会(the Presbyterian Church)成员,是一名基督教徒^[23]。1923年,丹麦国王陛下授予戴志骞丹尼勃罗格骑士勋位(the Order of Knighthood of Dannebrog),以表彰他为丹麦政府提供的特殊服务。

1924年8月,清华学校同意戴志骞休假一年,时间从8月算起。他跟妻子来到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专业训练与学习。旅行途中,他负责照料清华学校的留美新生队伍,他们人数多达130。戴氏夫妇的计划有点不确定。戴志骞可能希望在美国某所大学讲授东方文学;戴夫人却预定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编目部工作。这一计划最后得以改变,主要是因为戴志骞接受了爱荷华大学杰瑟普校长的建议,前往该校继续攻读研究生。他接受的学习课程包括教育统计,心理测量,学校管理,大学管理,现代哲学与图书馆教育,最后在爱荷华大学获得教育管理专业的哲学博士学位。在涂文中,戴志骞的博士论文被认为是美国有史以来图书馆学领域的第一篇博士论文。

5 研究启示与建议

5.1 注重人物心理分析在图书馆(学)史研究中的应用

戴志骞作为近现代图书馆学人的一员,首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也有七情六欲;其次是“学人”,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也会有改造社会的激情和对现世人生黑暗的彷徨;最后才是图书馆行业中人。受多重因素影响下的图书馆学人有着复杂的心态,因此我们不能忽视从人物心理的角度来考察图书馆学人和图书馆(学)史进程。我们对人物进行心理分析时,要注意那些影响人物一生的心理因素,比如能力、气质、性格等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心理因素,同时也不可忽视那些偶然的、变动着的

心理因素对人物行为的影响,因为即便是能力、气质、性格等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心理因素,也会随着人的环境、条件和个人努力的变化而发生变异。同时,历史人物各个时期的生理条件、健康状况或生理缺陷、疾病等都能对人物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造成影响,使人物的心理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人物的行为^[24]。以本文为例,勤学认真是戴志骞一生相对稳定的性格因素,无论是早年在圣约翰大学还是在美国留学期间都以勤奋获得优异的成绩;即便是在转行以后,面对陌生的金融领域,他更是发奋学习。因生病而赴东北疗养这一偶然性的因素,加上东北发展潜力巨大但形势不容乐观的新环境因素,两者结合,最终促成了戴志骞内心志向的重大改变。亲身经历“一·二八事变”后,他可能进一步坚定了其金融报国,驱除外来侵略势力的信念。胡庆生、王文山、徐旭、俞爽迷等一批图书馆学人由图书馆学转向其他领域也必然是各种外界环境因素与个人心理因素相互作用影响下的结果,需要我们从心理层面加以探析。当我们对人物进行心理分析时,就必须注意从该人物的日记、书信、自传、年谱、著作等文献材料以及口述材料中发掘、整理出反映人物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的素材,在分析、鉴别的基础上,对该人物的行为进行科学的心理分析^[25]。

5.2 建议加强对散布在海外的中国图书馆(学)史料的整理工作

本文的研究完全依赖于海外文献的发现。戴志骞完整生平长期不为学界所知,一方面是因为戴志骞晚年一直旅居海外,且国内图书馆界没有再传弟子;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长期未曾亲见存于海外的一手史料,甚至连研究他的二手材料也是迟迟才得以看到。从本文和已有的刘国钧^[26]、袁同礼^[27]个案研究来看,美国图书馆学界和图书馆学教育界有很强的档案保管理念和存史意识,美国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也非常注重与毕业学生(包括非美国籍学生)保持联系,登记更新校友信息,来往信件都会存档。其中,有关中国籍学生的档案资料,以及民国时期中华图书馆协会、国立北平图书馆等国内图书馆组织机构跟美国图书馆界来往的公文函件都是尚未被中国图书馆学界充分利用、有待整理开发的重要史料。笔者曾建议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图书馆史专业委员会(简称图史会)与台湾地区的图书馆学会、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开展相关合作研究^[28]。

在此,我们再次呼吁,并建议图史会可与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译出版委员会、CASHL 等机构合作,以大型特藏文献的方式购买引进这些海外档案(以复制品的形式),因为目前的 CASHL 特藏文献中尚无本学科资源。这必将对进一步推动中国图书馆(学)史研究走向深入,繁荣图书馆学理论建设,提供新的强有力的史料支撑。

致谢

感谢洛杉矶公共图书馆涂光霁(Kuang-Pei Tu)博士热情回复我们的咨询,她的研究具有不可抹杀的先行者意义!

参考文献

- 王余光. 图书馆学史研究与学术传承. 山东图书馆学刊, 2009(2): 1-4
- 韦庆媛. 图书馆学家戴志骞的激情与无奈.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0(3): 21-25
- 郑锦怀. 戴志骞生平与图书馆事业成就考察.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1(4): 115-122
- 平保兴. 16 位图书馆学者事略与著述考录. 山东图书馆学刊, 2012(1): 52-54
- Kuang-Pei Tu. Transform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Knowledge and Values: the Shaping of Library Service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6: 421-426
- 范凡.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 29-31
- 范凡.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 图书与情报, 2011(1): 131-134
- Among the Alumni. Library Service News, 1931, 3(1): 7
- Among the Alumni. Library Service News, 1932, 4(1): 5-6
- 顾焯青. 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人史料建设: 现状与展望.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0(3): 5-14
- 付敬生, 黄泰岩.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概况暨校友名录. 武汉: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 1991: 29-34
- 同 2
- 创制中学添设女子部及图书馆科. 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 1932, 1(5/6): 192-193
- 王子舟. 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245
- 戴志骞捐赠打字机.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 1936, 8(4): 600
- “中国图书馆学会”出版委员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四十年. 台北: “中国图书馆学会”, 1995: 183
- James I. Wyer Memorial Edition. New York state library school register, 1887 - 1926. New York: New York state library schools association, inc, 1959: 121
- 同 17: 126
- John Boynton Kaiser. Introduction. see: Tse-Chien Tai. Professional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New York: The H. W. Wilson Company, 1925: 1-14
- 徐以骅. 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26
- 此处综合了 1928 年版《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学生登记簿》上戴志骞的信息: New York State Library School. New York State Library School Register, 1887 - 1926. New York: New York State Library Schools Association, Inc, 1928: 138
- 李致忠. 中国国家图书馆百年纪事: 1909-2009.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 11-16
- 贝德士辑. 中国基督徒名录. 见: 章开沅. 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423
- 李振宏, 刘克辉著. 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第三版).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549
- 同 24: 548
- Robbins, L S. We never forget you: Liu Guojun and the Wisconsin Library Schoo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资讯传播与图书馆学), 2000, 7(2): 27-32
- 潘梅. 抗战时期袁同礼的图书请援活动及历史贡献. 图书馆, 2012(1): 28-32
- 同 10

作者单位: 江南大学图书馆, 无锡, 214122
泉州师范学院图书馆, 泉州, 362000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北京, 100871
收稿日期: 2012 年 6 月 19 日

A New Inquiry of Tse-chien Tai's Life Activities with a Focus on His Career Change and Final Destination

Gu Yeqing Zheng Jinhuai Cao Haixia

Abstract: Through some lately acquired first-hand English historical materials, Tai's life details become vivid. His diligence led to his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and perhaps his poor health as well. In 1930, because of severe disease, he had to resign from the post of Vice-Chancellor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He went to North-eastern China, and recovered there. However, his insight into the great potential and the grim situation of North-eastern China, combined with his care and love for younger generation, resulted in his determination to quit original profession and work as a financial pioneer. From 1931 to 1950, he worked for the Bank of China. In 1951, he moved to Argentina together with his wife, and died there in 1963.

Keywords: Tse-chien Tai; Life Activities; Library Science Scholar; Library Science History